

# 自贸区负面清单由长变短

2013年9月29日,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众人瞩目中掀起“盖头”,开启中国深化改革的破冰之旅;随即,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负面清单”也腾空出世。

“记得当年我还是一名从海外毕业归来的年轻大学讲师,

适逢上海自贸区成立的历史机遇,作为专家有幸参与到前期方案的规划研究中,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关键时刻,也成为我这些年来深耕的研究课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表示。

自贸

## 总体方案历经三版

2013年3月,上海乍暖还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外高桥保税区调研,在一个由仓库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透露了将设立中国首个自贸区的改革信号。

中国第一个自贸区怎么搞?陈波透露,上海根据李克强总理指示做的第一个自贸区方案版本并没有得到认同。1个月后,上海决定进一步集思广益、“开门”办自贸区,邀请专家就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等展开座谈,尤其是邀请有海外留学、智库背景的专家。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波从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归来,参加过 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讨论,对国外自贸区有相当研究,成为最早一批参与自贸区咨询研讨的专家之一。

在陈波看来,当时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空心化”难题,人口红利逐渐降低,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显现。更为重要的是,“正面对着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巨大压力”。2008年,美国强势加入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对其作出根本性改革,制定了一系列详细准入准则,要求今后加入 TPP 的国家必须全面对外开放,尤其强调金融服务的全面开放,这对正处于经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挑战。再联想到此前中国为加入 WTO 所做的多年艰难谈判,虽然中国当时没有加入 TPP,但必须在此之前先做好全面开放的准

备。而上海自贸区建设就是我国为这一准备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显而易见。

“据悉,上海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一共经过了三版,前两个版本被中央否决了,直到第三版,90%以上的内容被采纳了。”陈波表示,第三版也一度遭到部分中央部委的反对,担心“放得开”不一定“管得住”、监管风险太大。最终,这些反对意见大多数没有被采纳。于是,上海自贸区在一往无前的改革决心中开启了破冰之旅。

## 负面清单正面效应

当年的网络信息远不如现在这样及时丰富,国际经贸往来也有限,陈波关于 TPP 的说法让许多人眼前一亮。他认为,自贸区绝不仅是我国已有保税区的简单升级版,而是一个对国内外充分开放竞争下的特殊综合经济体。对标 TPP,上海自贸区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出台负面清单。

就在上海自贸区成立次日,即2013年9月30日凌晨,许多人和负面清单“相伴到黎明”,盼来了2013版负面清单。陈波透露,2013版负面清单主要是上海原有方案的升级,共190项。但出台后受到许多质疑和诟病,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太长了”“开放度不够”等。因为它主要依据当时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甚至有些本来在目录中没有被禁止的内容也被列入负面清单。

“但看似冗长的2013版负面清单,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是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突破。”陈波认为,过去对于外商准入的行政审批往往根据审批部门的“手势”,现在写入负面清单,实际上是和国际接轨的体现,既统一“手势”,又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重要观念突破。

于是,在2013版负面清单出台仅几个月后,2014版负面清单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加紧制定。又一次凌晨时分,“瘦身”后的2014版负面清单出炉,特别管理措施由原先的190条调整为139条,减少51条,调整率达26.8%,其中实质性取消14条管理措施、放宽19条管理措施,进一步开放比率为17.4%。

如今,当年发轫于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已缩短到两位数。“负面清单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领域的影响,它对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和理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从上海复制推广到了全国。”现在,虽然 TPP 已被“修改版”的 CPTT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代,但协议仍然保留了“全面开放、规则一致”的基本要求。如今,由于我国有了相对成熟的负面清单,在国际市场谈判中有了平等谈判的资本和共同的规则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面清单的作用已经实现了,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波说。

首席记者 宋宁华

# 超级工厂“落沪”从无到有

日前,特斯拉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数据中心同时宣布建设落成并投入使用。消息一经发出,受到多方关注。上海研发创新中心是特斯拉首个设立在海外、以整车开发为基础的研发中心;数据中心的落成,则意味着所有特斯拉中国业务数据将储存在中国境内。特斯拉官方发布的文章《特斯拉的“中国信心”》中提到,两大“心脏”项目的

落成是特斯拉中国化进程中递交的新答卷。文中称:“中国和特斯拉,挺搭的!”

恰逢中国“入世”20周年,本报独家专访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她讲述了特斯拉选择上海的原因,回顾了上海工厂的建设历程,并透露下一步特斯拉持续推进本土化的具体举措。

## 得益于改革开放

2018年,浦东新区临港迎来国内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实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上海工厂创下了全球汽车建造的新纪录。”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在多个场合称赞“令人惊叹的上海速度”。他还公开表白过:“我觉得中国就是未来!”

事实证明,马斯克的判断没有错。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运营不到两年,产量已在今年第三季度超过弗里蒙特超级工厂。上海两大“心脏”项目落成之日,特斯拉市值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短短3年时间内,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无到有,投资水平从低到高,反映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特斯拉“落沪”,也得益于中国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

## 选择中国的理由

但很多人不知道,特斯拉的“落沪”也是好事多磨。从2016年起,项目开始前期接洽,谈判持续了两年多。2018年初,中国政府实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出台了汽车行业“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的时间表。这为特斯拉项目的正式签约落地扫清了最大障碍,对特斯拉深耕中国市场

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中国向世界表明支持经济全球化、实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下,我们毫无顾虑地选择中国作为特斯拉在美国之外首个拥有本土制造产品的市场。”陶琳表示,中国的产业制造拥有极大优势,各级政府与公众对发展清洁能源、保护环境的目标高度统一,而上海拥有一流的区位优势 and 营商环境,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高端科技人才,为特斯拉带来产品生产、技术研发、人才引进等诸多便利,这些都成为特斯拉选择中国的重要因素。

## “上海速度”怎么来

短短半年时间内,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启动的目标,“特斯拉样本”既创造了大型工业项目建设的上海速度,更是积累了临港新片区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经验。

“建成投产的速度虽快,但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陶琳坦言遇到过不少挑战,“工厂设立之初,就一直面临供应链及进出口方面的各项挑战,国家及上海各级主管部门成立了重大项目办公室,确保项目稳步推动。”由于在各项流程的审批过程中,行业内并没有可借鉴的相关经验,国家及上海各级主管部门在确保合规的情况下,采取简化审批事项、精简申报材料、下放审批权限

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简化了审批流程,并专门根据项目情况制定专项服务清单,极大地提升了审批效率。

## 加大本土化投入

如今,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线总产能大于45万辆/年,产品不仅面向中国市场交付,而且完成了向汽车出口中心的转型。10月12日,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特斯拉中国9月份创造出交付56006辆车的的全新纪录,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394%。这相当于每46秒就交付1辆车。同时,特斯拉还在不断加大产品、充电、服务等方面的研发及建设投入,“双中心”的落成不但推动特斯拉步入全新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也为行业提供了本地化人才培养范式。

“过去两年时间里,特斯拉在中国形成了日渐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零部件90%以上来自中国,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超过99%的员工是中国人。特斯拉上海工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最离不开的就是中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对外开放政策。”面对未来,陶琳表示,特斯拉将不断加大在本土化投入,推动更多技术革新和生产流程优化,进一步推动能源清洁化转型,助力中国“双碳”目标早日达成。

本报记者 杨欢



陈波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



陶琳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